



1894-1927年间中国留日学生体育活动考略

周亚婷

摘要:采用文献资料法,对1894至1927年间中国留日学生的体育活动进行探讨。研究发现:由于日本对学校体育的重视和一批热血青年“曲线救国”借体育名义学习武备等原因,导致这一时期留日学生的体育活动开展的非常积极。他们在日本学习先进的体育思想与理论,回国之后进行传播;创办体育社团组织和体育专门学校,培养了许多革命志士和体育师资;翻译和编写源自日本的体育教科书,实现了从完全引进到逐渐消化吸收的过程。

关键词:留日学生;体育活动;曲线救国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1207(2016)02-0073-04

Sports Activities of the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Japan in 1894-1927

ZHOU Yating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021, China.)

Abstract: This essay made a research of sports activities of Chinese students who studied in Japan from 1894 to 1927 with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as the reason of Japan attached importance to school sports and a group of hot-blooded youngsters studied military in the name of sports to save the nation by indirect way, which lead the very positive sports activities of Chinese students who studied in Japan during this period. They studied advanced sports thoughts and theory in Japan, then spread them after returning to China; they trained lots of revolutionary soldiers and sports teachers by establishing sports organizations and specialized sports schools; they translated and wrote sports textbooks originated from Japan, then realized the process from the complete introduction of Japan to the gradual digestion and absorption.

Key Words: Chinese students who studied in Japan; sports activities; save the nation by indirect way

中日甲午战争,以清朝海军和陆军的战败而告终。令清政府更难接受的是败给了“蕞尔小国”的日本,战争的失利也给清朝政府苦心经营的洋务运动带来新的刺激。甲午战争后,清朝政府开始重视向日本学习,其中最主要的措施便是派遣留日学生去日本学习。这不仅符合日本方面的利益,也满足了中国人想通过日本去学习欧美,达到事半功倍的急切心里。留日学生到达日本后,由于当时国家的需要和政治环境,他们不仅学习先进的技术,对体育活动也非常关注。

1 留日学生热衷于体育活动的原由

旧式教育培养的中国学生,在私塾中并未接触过体育活动,但一部分的留学生到达日本后却积极投入到各种体育活动当中。这与当时日本对学校体育的重视和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一批热血青年借体育名义学习武备,以为革命所需有密切的关系。

曾受张之洞委托赴日考察的大臣姚锡光对日本学校体育课印象深刻,称:“学校无不有体操、兵操。”^[1]在嘉纳治五郎主持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体育一直为学校所重视。如早在1894年,体育就设置为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通识课程。1896年,学校将已成立的多种学生体育俱乐部,

如柔道部、击剑(剑道)部、弓技部、器械体操部、相扑部、草坪网球部、足球部、棒球部、自行车部、划船部、徒部、游泳部、乒乓部、橄榄球部等,统一组合成“运动会”,并由嘉纳治五郎亲任“运动会”会长。1898年,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召开了第一届学校长跑运动会,并和高等商业学校进行了网球对抗赛,成为日本网球史上最早的校际赛事。1901年,嘉纳治五郎校长将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运动会”改名为“校友会”,并继续担任会长。同年还举办了第二届学校长跑运动会,并从此形成了每年举办一次长跑运动会的学校传统。1902年嘉纳治五郎又创办了弘文学院,弘文学院是一个具有多学制的预科学校,既有3年制的普通科教育,也有6个月到1年半不等的速成科教育。然而值得强调的是不管哪种学制教育,日语、修身、体操这3门课程自始至终被列为必修课程。所以为了向中国留学生志愿者教授日本柔道,弘文学院早在1903年即将校园内的一处房屋改成柔道场,并称为“讲道馆牛込分场”,嘉纳治五郎校长自任讲道馆馆长,向志愿者开设柔道讲座。

到弘文学院读留学预科的鲁迅,于1903年弘文学院首期柔道讲座中也报了名。当时报名参加1903年柔道讲座的共有33人留日学生,其中报名表第一页上就有周树人(鲁迅)的名字^[2]。在弘文学院,柔道讲座并不属于体育

收稿日期:2016-02-23

基金项目: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5BTY083);2015年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KYLX15-127)。

作者简介:周亚婷,女,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体育史与奥林匹克研究。E-mail:zhouyating12@163.com。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体育学院,江苏苏州215021。



正课,一律为自愿参加。所以鲁迅的报名学习,更反映了当时他对日本柔道的特别兴趣。

按照弘文学院柔道讲道馆章程要求,大凡参加者必须遵守所规定的《誓文》5条。即第一条,此次至贵处学习柔术不中途停止;第二条,决无有损贵处声誉之任何行为;第三条,未经许可,不以柔道教授他人;第四条,未经许可,不向外人言及贵处风情或带领外人观看;第五条,学习中,必须坚守各项规则,即使得到许可从事教授,亦决无有违贵处成规之事。当时的鲁迅曾以“周树人”的本名提交了誓约书。1982年日本鲁迅爱好者编辑的《鲁迅之会会报》,曾刊载了“周树人的柔道誓约书”。为了练好柔道,鲁迅在弘文学院江南班中还是第一个剪去辫子的人。他曾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说:“我的剪辫,归根结蒂只为了不便,一不便于脱帽,二不便于体操,三盘在脑门上,很令人气闷。”这表现了当时鲁迅坚持练习柔道的决心。据说他还曾在东京穿上白衣服,练习过日本传统的摔跤^[1]。

致使留日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原因不仅有日本对学校体育的重视,还有中国政府和留日学生自身的原因。1903年,张之洞拟定的《自行酌办立案章程》中,限定“武备一门,非官派学生不准保送。”^[4]外务部不久正式通告留日学生总监督,未经各省督抚学政咨送,一概不准入士官学校肄业。1904年,练兵处在《选陆军学生分班游学章程》中也规定:“学习兵事,专为国家振武之用,自应由官遣派,不得私自往学。其有现时业经在日习武之自费生,应由驻日大臣及监督,察其志趣向上,学业精勤,年限未滿者,随时咨明练兵处,贴给旅行费,改为官费生,以资造就。自此次定章后,凡赴日学习武备之自费生,即行禁止,以归一律。”^[4]这些章程的下达给想去日本学习军事,怀揣救国梦的青年学子当头一棒。但是当时的青年人非常热衷于学习军事,甚至女青年也十分向往。欧阳予倩曾回忆说:“到日本的时候,满心学陆军,最羡慕的是日本兵裤子上那条红线。在成城学校做制服的时候,我硬叫裁缝在我的裤子上加一条白线,以为不像兵也要像警察,那裁缝始终不听,当我小孩子,向我笑笑罢了。日本兵穿的鞋子,满底上都钉的是铁钉,鞋面的皮,其粗无比,我每从鞋铺走过,总想买一双,就比其余的同学高明些。但尽管如此,终究因为眼睛有些近视,没有能进陆军学校,就是短衣镶边和大裤脚的海学生制服—我最喜欢那个装束—也没法穿上。于是有人劝我学军医,便也可充准军人,但是也没有能达到目的。”^[5]

所以一部分人采取了“曲线救国”的方式,以去日本留学体育为名,实际是学习日本军事,以便投身革命。如陈更新,1905年以“励志社”高等班第一名毕业,旋即东渡,翼入日本陆军大学速成班学习陆军,适清廷下令厉禁自费学军事,乃入东京九段体育会,日习马术、步操,夜习数学、日语,终日营营,略无倦色^[6]。林修明,1905年入日本东京体育专修科,留学期间参加了同盟会。1906年回国,以办教育为名,从事推翻清朝反动统治活动。曾先后在松口体育学校、松口中学、丙村三堡公学、蕉岭中学任体育教练,秘密鼓动革命,策划反清活动。1911年3月29日,林修明参加了著名的广州起义。他奉黄兴之命,带领从松口中学挑选的30名精干队员,担任先锋队,参加攻打督署。在仓

边街与清兵激战一昼夜,后因寡不敌众,弹尽援绝而失败。林修明不幸中弹牺牲,时年仅26岁,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7]。徐翰文,1905年入日本体育专科学校学习。1906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国后入清军太原常备军第一营。山西巡抚满族人恩寿下通缉令,抓捕同盟会会员,他便回家躲避。后接受同盟会总部“准备实行武装起义”的指示,于1907年初,同王建基等,在绥远萨拉齐等地发动武装起义,结果因条件不成熟和力量悬殊而失败。被捕时,年仅29岁,为革命献出了生命^[8]。

2 学习先进的体育思想与理论

留日学生到日本后,怀揣救国梦想,努力学习日本的先进思想,以期能够尽早回国挽救当时民族危亡的现状。他们看到日本能够摆脱列强的瓜分,甚至于在日后战胜俄国,主要在于仿照德国实行“军国民教育”。由此军国民教育便成为当时留学生最早从日本引进的先进体育思想与理论。所谓军国民教育,一般包括:(1)在各级各类学校中普及军事知识的教育和军事技能的训练,体育课尤重兵式体操,以培养一代具有军人本领的国民;(2)重视学校体育,发达学生身体,使之德智体全面发展,以增强民德、民智、民力;(3)宣传武人战功,进行爱国的尚武教育,改变中国文弱的民风,培养国民的民族观念和爱国精神^[9]。

1902年,留日学生蔡锷、蒋百里等人,率先在《新民丛报》、《江苏》和《浙江潮》等刊物上发表有关文章,宣传军国民教育思想。蔡锷和蒋百里都曾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蔡锷1899年7月赴日留学,先后入陆军成城学校、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蒋百里于1901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科学习。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世界著名的军事学校,与美国西点军校齐名。除重视军事教育外,体操教育也是学校的重点科目,如在考试科目中,技术科就有马术、体操、剑术^[10]。

留日学生在日本军事学校中大多成绩优异,表现优秀。例如蒋百里、蔡锷、张孝准被誉为“中国士官三杰”。其中的佼佼者蒋百里更是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一的成绩毕业,击败了同期300多名日本学生,包括后来的侵华大将荒木贞夫、小矶国昭、冈村宁次等同学。按照学校的规定,毕业第一名者,可获日本天皇所奖的军刀。天皇所奖的军刀被“支那人”所得,同期的日本学生引为奇耻,但对于蒋百里的学科、术科优异表现,则又翕然倾服^[11]。也正是由于此次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军刀为中国留学生所得,自此以后,步兵科原来一起上课的中、日学生开始分班学习,以防中国留学生再度夺魁^[12]。

受日本军事学校的耳濡目染,使得留日学生结合当时中国的现状,最早提出了“要扩充军人教育于学校和社会”,“军人之知识、军人之精神,军人之本质,不独限之从者,凡全国国民,皆亦具有之”。从而将西方的军国民教育引进了中国,并对后来的学校体育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体育课程中一系列的宗旨和方案,都强调了实施军国民教育思想的必然性和具体要求。在1906年《学部奏宣示教育宗旨折》中,提出要把“尚武”列为宗旨之一,并要求“凡中小学堂各种教科书,必寓军国民主义”,特别强调学校体育课



应以兵式体操为主。在1911年《清定军国民教育主义案》中,提出了对学校实行军国民教育的具体要求:“奏请特颁谕旨,宣布军国民教育主义;通令高等小学及与之同等以上之学堂,一律打靶,并讲授武学;各种学堂,体操课一律列为主课”。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14条),其中规定:高等小学以上,体操科应注重兵式^[13]。1912年7月的教育部临时教育会议、1915年《大总统颁定教育要旨》,都极力倡导在中国实行军国民教育。

由于军国民教育思想是在中国寻求救亡图存的特殊时代背景下提出的,所以得到大多数有识之士的推崇。如时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生,正式提出了“军国民教育”。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实行军事编制,开设以兵式体操为主的体育课程。所以当时的学校体育几乎全被兵式体操和军事训练所替代。据宋君复回忆:“我生在清末光绪年间,家乡是浙江绍兴。进私塾读书时候,……不能乱蹦乱跳,连体育两个字都没听过。后来转入小学,也没有上过体育课,只有军事体育,内容是立正、稍息、开步走。”^[14]

这些情况在留日学生陆续回国后有了些许的改变,例如1903年留日学生黄兴回国后受聘于长沙的明德中学任体育教师。明德中学是由著名的留日归国学者胡元倓创办的。在这所学校任教的还有另外一位大名鼎鼎的体育界领袖王正廷。黄兴在明德中学任体育教员期间,教授内容主要是兵操和器械体操,他曾给人们留下的普遍印象就是一个好体育老师。据黄一欧所记,黄兴在明德中学时,一边任教,一边通过体育活动,联络同志,发展会党。他当时已剪辮,在学堂时多着操衣。他喜欢体育活动,下课后总是在操场上踢足球、翻杠子、跑圈子等。在教学中他常以尚武爱国的思想教育学生,强调强国必先强身,强身必行体育锻炼^[15]。从而使明德中学自开办以来即养成了尚武、爱国的校风,体育成为明德中学的传统与名片,并与当时的南开齐名。有所谓“北有南开,南有明德”之说^[16]。

在明德中学期间,黄兴还曾有为湖南私立第一女学堂教体操课的兼职历史。当年的学生亦有回忆:当时“上体操课的实际只有我们十几个没有包过脚的大脚姑娘。黄老师不到学堂里,我们自己整队至东茅街许宅过厅去上操。他穿着一件酱色纺绸长褂,教我们翻杠子,做柔软体操,玩哑铃。没有双杠设备,就要我们把床铺架子搬出来代替,叫我和龙珏表演给大家看。柔软体操是日本式,黄老师从日本学来的,他教学生很耐烦,从无疾言厉色。”^[17]

3 创办体育社团组织和体育专门学校

留日学生早在留学期间就开始创办体育社团组织,其中建立最早的是1898年蔡锷、林锡圭发起成立的“东京九段体育会”,这也是中国留日学生建立的第一个群众社团,内容主要包括学习日本兵式体操和练习射击、打靶等活动。1903年,留日学生为抗议沙俄霸占中国东北拒不撤兵,在日本成立了“拒俄义勇队”,后来由于日本神田警察的干涉,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军国民教育会”的课程计分3部:一是射击部(打靶、击剑);二是体操部(普通体操、兵式体操);三是讲习部(战术、军制、地形、筑城、兵

器)^[18]。宗旨是“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19]由此可见,留日学生创办的体育社团,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军事训练的性质,这与当时“救亡图存”的历史大背景是相吻合的。亦如当时的一些留学生所回忆,体育社团的“队员每天清早秘密聚合到大森习射击,黄兴懂得军事知识,由他给义勇队教授枪法。”^[20]“每星期三、星期六午后及星期日,分赴京桥区及各体育场,实弹射击,练习枪法,每次每人自备弹药三十钱,意气激昂,精神发越”^[21]

这一传统后来也带回到国内,如留日学生陈独秀于1903年在安庆成立的爱国会下设立了“体操会”;留日学生徐锡麟等人于1905年则创办了著名的“绍兴体育会”;留日学生陈达等也在1906年成立了“丽水体育会”^[22]。这些体育社团通常以习练体操和射击打靶为主,有着强烈的军事体育色彩。

留日学生不仅积极创办体育社团,而且还在回国后创建了体育专门学校,从而为清末民初体育专业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早在1905年,留日学生徐傅霖就在上海创办了体操游戏传习所,为的是“以养成速成体育教员,供各校所需。”^[23]这种办体育传习所的方式,无论从名目还是内容也都源自于日本。

1906年,晚清政府学部向全国发出了《通行各省推广师范生名额电》,其中要求各省城师范,“并须设5个月卒业之体操专修科,授以体操、游戏、教育、生理、教授等法,名额百人,以养成小学体操教习”。并通知说:“5个月内,本部当派视学官分省巡视”。在此影响下,更激起了许多留日学生创建体育专门学校的热情。如留日学生谢逸桥、谢良牧等人于1907年8月,在广州梅州(今梅县)创办了松口体育会。松口体育会实际上是一所体育专门学校,这也是受当时日本文化的影响,如日本大森体育学校亦称大森体育会^[24]。松口体育会设有“专修”、“普通”、“简易”3科。

在留日学生创建的体育专门学校中,尤以徐一冰、徐傅霖等人于1908年在上海创建的“中国体操学校”最为著名。该校从1908年起,到1927年止,共毕业学生36届,计1531人。为培养体育专业人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该校毕业的学生也大多从事体育事业,影响了近代体育的发展。例如有上海东亚体育专科学校校长庞醒跃,上海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校长陆礼华,苏州中山体育专科学校校长朱重明、周德,学校体育“三段教学法”的创始人王怀琪等等。与中国体操学校齐名的还有“中国女子体操学校”,也是1908年由留日学生创建的。

4 翻译和编写源自日本的体育教科书

20世纪初,随着中国各地新式学堂的建立和体操课程的普遍设置,与之匹配的教科书成为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由于中国体操课程主要以日本为模板,所以在翻译教科书方面,首先选择了日本。留日学生因为较早地接受了日本的教育和文化,所以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了向国人译介教科书的职责。他们最早通过创办翻译团体来进行编译教科书。1902年留日学生陆世芬等“在日本东京纠合同志,设教科书译辑社,编译东西教科书,备各省学堂采用。”^[24]

最初留日学生主要是直接翻译日本的学校教科书,以



为我用。例如在教科书译辑社最早的出版计划里,就有《体操教范》这本书^[24]。1903年,由丁锦翻译了日本坪井玄道和田中盛业合著的《蒙学体操教科书》,以及山本武的《高等小学游戏法教科书》两本书。其中《蒙学体操教科书》共4章,包括:整顿法;矫正身体术、徒手体操,并附图说明^[25]。这本教材是我国第一本较为系统的小学体育教科书,也是我国在教科书封面注明的最早学生使用的体育教科书^[26]。书中在翻译时甚至连教材的原有日文序文都没有删去,而被直接使用,反映了当时我们在教科书上对日本的依赖。

在直接翻译日本教科书的基础上,后来逐渐过渡到对日本原有教材的编译,以便更适合我国教学活动的实际需要。如1906年,蔡云对日本川濂元九郎和手岛仪太郎合著的《新撰初等小学体操教科书》进行的是编译工作。这一期间编译的日本教科书还有如《课堂运动法》(徐筑岩,1907)、《高等小学体操教科书》(黄元吉,1907)等。

再后来,则更发展到留日学生根据日文资料并结合自己的认识感受直接编写教材,如徐傅霖于1908年和1913年编写的《初等小学女子小学体操范本》、《高等小学新体操》两本书,1924年庞醒跃编写的《体育管理》、1927年谢似颜编写的《田径赛的理论与实际》。这些书虽说都有日本教科书的烙印,但却开启了国人自己编写教科书的先河,从而最终完成了国人从引进日本教科书到消化日本教科书的完整过程。所以美国学者任达曾指出:“在各类翻译材料中,对中国思想及社会最具渗透力和持久影响的,莫过于教科书。”^[27]

5 结语

从晚清时期尤其是甲午战后一直到民国初年,留学日本成为一种时代浪潮。日本学者青柳笃恒生动的描述这一景象:“学生互相约集,一声‘向右转’,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24]这些学生在当时中国“救亡图存”的背景下,注意学习日本先进的体育思想和理论,通过创办体育社团组织和体育专门学校,以及翻译和编写源自日本的体育教科书等具体措施,为近代中国早期体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 [1] 吕顺长.教育考察记[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6.
- [2] 张才生译.周树人柔道入门志愿书[J].纪念与研究,1982(4):210-213
- [3] 徐明华.鲁迅与体育[J].中国体育科技,1995(12):43-44.
- [4] 陈学恂,田正平.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M].上

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58,25.

- [5] 欧阳予倩.自我演戏以来[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6.
- [6] 中共福州市委宣传部,福州市社会科学所.福州历史人物(第3辑)[M].福州:福州建联印刷场,1989:103.
- [7] 蕉岭县志编纂委员会.蕉岭县志[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22.
- [8] 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7卷(73-84辑)[M].太原: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2001:530-531.
- [9] 韩玉霞.清末民初的军国民教育[J].史学月刊,1987(5):39.
- [10] 丁果.关于振武学校的珍贵资料[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4):66—68.
- [11] 高拜石.古春风楼琐记(第三集)[M].台北:台湾新生报社出版部,1981:312.
- [12] 史全生.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6:99.
- [13] 中华民国教育部普通教育暂行颁发通令[J].教育杂志,1912(10):99-100.
- [14] 苏克竞.中国近代学校体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60.
- [15] 崔乐泉,罗时铭.中国体育思想史近代卷[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91.
- [16] 张子沙,李远乐等.黄兴体育思想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0,33(8):12.
- [17] 罗慧.黄兴—明德中学史上最牛的体育老师[N].三湘都市报,2010-9-8(C15).
- [18] 浙江省图书馆.浙江省辛亥革命史[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302-303.
- [19] 夏林根,董志正.中日关系词典[M].大连:大连出版社,1991:19.
- [2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14.
- [21] 杨天石,王学庄.拒俄运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315.
- [22] 罗时铭.体育通史第3卷[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8:137-138.
- [23] 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297,71.
- [24] 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83,184.
- [25] 张晓.近代汉译西学书目提要(明末至1919)[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32.
- [26] 刘斌.从体操到体育—清末民国中小学体育教科书研究[D].湖南:湖南师范大学,2011:83.
- [27] 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133.

(责任编辑:杨圣韬)